

民国时期揭阳夏布海外贸易初探

靳炜伟¹, 欧俊勇²

(1. 韩山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00; 2.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教育系, 广东 揭阳 522000)

摘要: 夏布是近代揭阳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和潮汕地区大宗对外贸易商品。夏布的商业化发展促使其形成了粗加工为主的生产方式, 加强了揭阳与内陆城市、周边城市的贸易互动, 远销汉城、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同时, 揭阳地区广袤农村腹地所形成的耕织生产方式, 为夏布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保障。夏布的海外贸易反映了潮汕商业的网络结构。在洋布的涌入和二战的影响下, 夏布逐渐走向衰落, 这与传统夏布产业缺少科技含量、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世界贸易壁垒存在着诸多的联系。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揭阳; 夏布; 海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 J5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14X(2019)03-0067-05

夏布是揭阳的传统产业, 也是民国时期潮汕地区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1903年4月5日《大公报》(天津版)称: “潮属揭阳土产以夏布、蔗糖为大宗”^[1]。夏布又名苧布, 是一种有苧麻加工纺织而成的布料, 工序大致“以半脱胶苧麻手工劈麻, 捻绩成纱后织成”^[2], 主要作为夏天的暑衣和帐布, 因为其质地清凉透气, 广泛受到运销地民众的欢迎, 潮属夏布以揭阳为佳, “揭阳所产独多且佳, 故凡潮州出产之夏布咸标揭阳名”^{[3]1503}。冠以揭阳产地的夏布独享盛誉。按黄光启的分析, 到了清末民国初期, 揭阳夏布的出口贸易量达到全潮汕地区的半数以上, 渔湖一都 108 村均以编织夏布为业, “但以西部近城各村为盛”^[4]。其时, 揭阳县从事夏布织造的总人数共计约 15 万人之多^[5], 规模极大。

一、苧麻的商品化

张勳的考证认为, 夏布的原材料苧麻原产地“无由判明, 称为 China-grass 及 Rhen 之 B.niver 大概系我国之原产”^[6]。在张氏对苧麻的种植范围的统计中, 广东潮州地区也是重要的种植地之一。^[6]清中期, 揭阳的苧麻种植已经达到一定规模, 《揭阳县志》载: “苧布, 九都皆有, 乡无不织之妇也。”^[7]但是到了近代, 夏布业的发展推动了揭阳对苧麻原料的需求, 所谓“出产甚少”以致苧麻原料“多来自汉口”^[5]。

但是夏布在海外的良好销路刺激了苧麻的商品化发展, 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的主要种植区, 通过汉口这一长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8], 渊源不断地运往潮汕地区, 以弥补夏布业所需的原材料不足(见表 1、表 2)。据统计, 1920-1923 年, 潮汕地区苧麻的输入数量维持在 70, 000 担以上, 到了 1936 年其输入贸易额达 1,254,289 元^{[3]678}。苧麻除了来自汉口、九江、岳州等地的贸易周转外^{[3]678}, 还从台湾地区输入苧麻, “因织夏布业极盛, 自给不足, 每年由长江上游地带输入外, 尚自台湾输入”^{[6]71}。夏布原料的另一进口地来自南洋, “自新加坡运至海口, 由海口转销与粤东, 大部分运至揭阳。”^[9]这说明, 苧麻已经成为输入潮汕地区的重要商品, 因为以揭阳为代表的夏布业的蓬勃发展对原材料有着巨大的需求。

表 1 汕头港苧麻输入统计表^{[6]71}

时间	数量(单位: 斤)	价格(单位: 元)
1911	90, 697	31, 309
1915	173,147	64,115
1916	186,486	73,919

作者简介: 靳炜伟(1982-), 女,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地方文化项目(GD16DL01)。

表2 民国潮州地区海关对国内贸易移入苧麻数量统计表^{[3]676}

时间	数量(单位:担)	值额(单位:元)
1911	62,685	893,802
1915	74,134	1,076,893
1918	50,179	582,704
1920	70,500	1,267,514
1921	76,720	1,272,388
1922	71,585	1,317,610
1923	70,114	1,288,377

民国《潮州志·商业志》的记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布业与苧麻原料输入的关系：“州（潮汕地区）人纍苧以织夏布，为数极多。惟苧之植仅揭阳有之，缺量甚钜，故有入口额如斯。稽夏布出口量元年（1911）为七九八〇担，十二年（1933）为八一〇四担，于此亦见斯业之盛详。”^{[3]548}夏布业的兴盛推动了苧麻的商业化发展，使其成为揭阳与中国内地商业贸易的重要物品。

苧麻原材料的商业化还促使了苧麻出加工业的发展，为了方便运输与加工，往往从原材料集散地开始，就对苧麻进行了粗加工：“工人将整件麻苧分为片，然后再抽为纤维状丝条，始，引落织布机，抽织成疋后，以清水漂白晒干，然后打装运销各地。”^[5]苧麻的粗加工为夏布的织造提供了便利，也进一步提高夏布业的产能。

传统的夏布织造多为手工，而潮汕妇女向来有织造传统，“向习缝纫、织布、织履”^[10]。在民国时期，手织夏布成为揭阳传统家庭收入的重要方式，妇女们往往以夏布织造为业，呈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揭阳农业向不亚于邻县，但男人虽多从事劳作。而女人则多以织夏布、帐布为生，其中下人家多置有木织布机，或三五户共置一架，家庭手工业颇盛一时”^[5]。夏布业为民国揭阳妇女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收入，这种“家庭手工业颇盛一时”的历史景象背后反映的是夏布良好的贸易态势。

总之，夏布在海外的贸易推动了苧麻的商业化发展，并且使其形成了粗加工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揭阳与内陆城市、周边城市的贸易互动。同时，揭阳地区广袤农村腹地所形成的耕织生产方式，为夏布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保障。

二、夏布的海外贸易

民国揭阳夏布的海外贸易及其兴盛，且独具地位：“夏布为中国特产之一，制自宁（苧）麻，纤维出以手工艺。为著名之家庭工业，中国为产纤维最富之国，……江西、广东、湖南、福建、四川均以产夏布著，江苏亦有不少出品，他如湖北、广西、河南则所产较少。江西之万载、广昌，湖南之浏阳，广东之连阳、揭阳货品最佳。福建，四川，江苏较次。”^[11]民国时期，揭阳所产夏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夏布）既负盛名，销地以朝鲜、台湾为最，上海次之”^{[3] 1503}，按照当时统计，除了以汉城为销售中心外，夏布还远销日本、香港、暹罗、新加坡、南洋群岛、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亚丁、菲律宾等处^[11]。可见，夏布的商贸范围几乎与当今海上丝绸之路范围相当，在海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表3《民国潮汕地区常关夏布及苧麻线索贸易出口统计表》则显示，从1915年至1921年，潮汕地区夏布出口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在1920年到达顶峰，为11,941担。时人甚至估计，“揭阳夏布，除销售潮梅各县外，而辄经出口尤多，以上海销售最大，南洋群岛次之，至于华北及常见各埠，日本、高丽等地，多由上海转销，最盛时销百万以上，石叻、暹罗等地，因地处热带，夏布及帐布每年销额，亦有数十万元……揭阳夏布、帐布最盛时，每年总数有三百万左右”^[5]，足见揭阳夏布贸易规模之大。

夏布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质上是揭阳商业网络拓展的结果。长期以来，潮汕地区在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移民，形成了稳定的商业网络结构，揭阳不仅仅是夏布的产地，还是夏布的集散地，所谓“潮普夏布亦多集中揭阳以轮海外，昔出产年将三万匹”^{[3]1503}。也就是说，潮汕地区所产出的夏布由揭阳作为集散地再经由汕头港发往外地，这与揭阳夏布形成的良好声誉有很大关系。《潮州志》称：“夏布大部分销售上海，出产以江西、四川、潮州三处为多，由山东客办入转销高丽等处……四川发生战事，货少出口，潮州夏布于沪上遂首屈一指。是年增至二万余件，值三百万元。”1925年前后，因为四川战事影响，

表3 民国潮汕地区常关夏布及苧麻线索贸易出口统计表^{[9]680}

时间	夏布(单位:担)	苧麻线索(单位:担)
1915	2,988	8,349
1916	4,413	5,388
1917	4,354	6,314
1918	7,400	4,558
1919	10,833	7,189
1920	11,941	6,615
1921	11,131	6,083
1922	9,548	8,781
1923	5,830	6,389

四川夏布很少售往上海,潮州夏布随之占据了上海夏布市场,再由上海转销高丽等处。上海作为揭阳夏布的转销地原因不仅仅是四川夏布的少出,而与潮汕在上海贸易商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揭阳专营夏布贸易的著名商号就有朱阶记、黄万隆、林祐记、林德记、许合发、光德成、郑成记等,其中1923年上海潮州会馆编的《上海潮州会馆三帮董事会章程》所开录的董事会24人名单就有谢祉衡的朱阶记^[12]。而澄海人周良的商号“光德成”除了经营夏布外,其另外的身份则是经营东南亚侨批的批馆,对东南亚一带商业贸易十分熟悉。那些被誉为“出口商”的群体也在南洋群岛的夏布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南商、暹商等,他们“以采办潮州土货”运销南洋各地而闻名,运销的主要商品就有夏布^[13]。商品由轮船运送到南洋地区,其中1933年南商及暹商在汕头南郊商号各有54家,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华暹公司购置了四艘轮船,经香港中转,“川行汕头曼谷间”^{[3] 708-709}。实际上,经营夏布运销的不仅仅是揭阳或者中国商人,洋商早在清末就开始与潮州人接触经营夏布贸易,1881年8月7日《申报·新闻·连次被窃》的报道中就有上海太古洋行(即英国中国航业公司)洋商与潮州商人夏布买卖的纠纷^[14],夏布贸易显然不是潮州商人的专利。由此,夏布经揭阳集散后销售海外的网络基本可以分为两条线:其一,经汕头港往上海,运销高丽、日本;其二,经汕头港转香港,运销南洋各地。但是,值得提醒的是,夏布在高丽(朝鲜)及日本的贸易远远大于南洋各地,按《潮州志》引1934年《海关报告》统计数据,高丽及日本销售额占全年贸易额的93.79%,见表5。商业网络的形成对揭阳夏布海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使得夏布能够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表4 《潮州志》据《海关报告》潮州夏布运销统计表

时间	数量(单位:担)	总额(单位:元)
1912	7,980	—
1913	6,378	915,437
1914	5,634	711,960
1915	4,890	711,512
1916	5,831	1,684,716
1917	6,044	85,110
1918	8,800	1,599,276
1919	12,373	3,417,920
1920	15,052	3,788,433
1921	13,219	2,887,831
1922	10,781	1,626,262
1923	8,104	984,411

揭阳夏布海外贸易的成功还得益于潮汕农村腹地廉价的劳动力。潮汕地区历来手工业发达,女性从事织造业可以补充家庭收入,夏布的海外贸易为揭阳农村腹地的女性劳动者带来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其织工十九系属闺秀,或中年失夫之寡妇,脱俗斋姨等”^{[15]128},甚至夏布织造成为一些失去经济依靠女性的职业选择。在家织造夏布成为一种工作模式,即使到了1935年开始开设工厂,其情形也如此:“至于开设

厂雇工，或将原料发给妇女织造系论件计值。”^[5]至于成本可谓低廉，“每天造成织造数小时，如是一疋布之织工，最少以年计，于是每日所得工价，亦不过角于而已。”^{[15][28]}计件可见，夏布织造在当时劳动力成本之低。夏布的贸易将潮汕农村腹地的剩余女性劳动力吸纳进来，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也是夏布在战前所活动的优势。

表5 《潮州志》据《海关报告》1934年潮州夏布国外运销统计表

销往地	数量(单位:公担)	总额(单位:元)
香港	33	11,492
日本	233	57,310
朝鲜	4,755	1,287,553
其他各国	297	72,912
合计	5,318	1,429,267

当然，夏布海外贸易的成功还得益于潮州商人长期养成的良好信誉有关。潮人紧密的族群纽带是近代潮汕商人信用的核心^[16]。潮汕商人信用前者论述极多，此不作赘言。

三、夏布海外贸易的衰落及其历史启示

夏布海外贸易随着国外大量洋布的涌入及1939年末汕头的沦陷，夏布运销不出，以致布价大跌，织户随着纷纷停产^{[4][15]}。揭阳夏布贸易急转直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摈弃战争因素不言，检视历史，夏布海外贸易的失败在现在讨论如何建构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的语境下，依然有不少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传统夏布缺少科技含量。夏布生产长期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几乎全部依靠潮汕腹地女性劳动力进行手工织造完成夏布工艺，使得夏布生产失去了科技含量，也降低了生产效能。《潮梅现象》一书的描述中，苧麻因为质地关系，“逾年前（1924）本省建设厅当来潮征求夏布试用，而汕头某夏布庄拟将织法改良，改用机器织造，但结果等于泡影，盖因苧质坚硬易折，遇机即断，据当局试办情形，以半苧半棉试织，后改以经棉纶苧，则纶之苧不能吐，亦不能织造，经此以后，织法更无人加以考究”^{[15][28]}。实际上，通过软化苧质，完全可以达到纺织效果，但是对于现代工业的排斥，使得夏布生产失去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导致最后在洋布涌入中国时溃败的结果，丧失了市场竞争力。当我们讨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贸易，首当其冲的是增强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使其快速占领市场。

其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销失衡。1925年，潮州夏布因四川夏布受战事影响而在上海获得成功，当年夏布贸易增至二万余件，约值二百万余元^{[15][28]}，这一突然的增长，大大刺激了揭阳本土及周边夏布生产，商家纷纷视为利藪，放弃原来的产业而投入夏布的生产，一时夏布厂家增长到数十家，日夜赶货，一图获利。其结果就是粗造烂制，被视为次货而使得商家纷纷倒闭。因为夏布行业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严重影响夏布的外贸，1923年总商会不得不出面劝解改良夏布：“惟察阅潮商辩明各节，仅注意于退货扣价、破湿赔偿，而于成色参差之弊……吾国专利物品，若再不乘时讲求，恐数年后亦将无立足之地。”^[17]这也提醒我们，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时，必须重视产业结构的合理分配，重视产品的质量，维持中国产品的品牌形象。

最后，夏布产业缺乏应变手段，受困贸易堡垒。日本占了朝鲜后，为提高自身布业的竞争力，设置了层层贸易堡垒，将夏布设为奢侈品，并以此为名目，“增加奢侈品国税，规定值百抽百税率”^[18]。作为长期将朝鲜作为销售地的潮州夏布业而言，其利害受到极大影响，这引起了潮州商人的强烈不满，致电驻日中国使馆提出交涉。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交涉显然无助于事。日本强行制订的奢侈税规定为夏布在朝鲜的贸易设立了贸易的堡垒。而反过来，1927年，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一二七六号令明确要求“潮州夏布所增加之出口税碍难豁免。”^[19]1928年，广东汕头总商会、揭阳县商会等再次向当时财政部请求夏布按照土布规定予以免税，而财政部第六六八七号批文回复则认为夏布与土布不同，尽管日本关税提高，但不在免税行列，不予免税^[20]。一方面是国外的商业堡垒，一方面在国内又难以得到政府有效的税收支持，内忧外患的夏布海外贸易注定走向衰落的道路。当今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离不开商业贸易，历史的经验提

醒我们, 良好的贸易秩序的公平规范与灵活高效的商贸策略将是一种实现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有效策略。

检视历史, 夏布产业的盛与衰再次启示我们, 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过程中, 应该着重用于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优化产业结构, 着重于产业的转型升级, 摒弃传统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同时, 作为对外贸易的手段, 应该建成良好的商业秩序并且通过有效的贸易手段, 打破固有的商贸壁垒, 使中国制造的产品顺利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上获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 [1] 佚名. 中外近事: 福建[N]. 大公报(天津版), 1903-4-5.
- [2] 夏征农, 陈立. 大辞海: 化工轻工纺织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284.
- [3] 饶宗颐. 潮州志[M]. 潮州: 潮州修志馆, 1949.
- [4] 黄光启. 揭阳夏布业盛衰记[A]. 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 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上辑)[C]. 1991. 12.
- [5] 佚名. 各地新闻: 潮产夏布衰落[N]. 益世报, 1935-4-17.
- [6] 张勳. 种苧麻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 [7] 陈树芝. 揭阳县志: 物产[M]. 雍正九年(1731)刊本: 50a.
- [8] 斯波义信. 中国都市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18.
- [9] 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30-31.
- [10] 崔炳炎. 潮阳县民情风俗调查[Z]. 1909.
- [11] 谢富兰. 中国之夏布及草帽辫[N]. 申报, 1927-6-30.
- [12] 上海潮汕联谊会. 上海潮州会馆三帮董事会章程[A]. 潮州旅沪同乡会历史资料(二)[C]. 1995. 59.
- [13] 佚名. 国内要闻: 潮汕商人罢运风潮[N]. 申报, 1928-9-17.
- [14] 佚名. 新闻: 连次被窃[N]. 申报, 1881-8-7.
- [15] 谢雪影. 潮梅现象[M]. 汕头: 汕头时事通讯社, 1935.
- [16] 林济. 近代潮商的汕-香-暹-叻国际贸易与商人组织[J]. 近代史学刊, 2006, (24).
- [17] 佚名. 总商会劝改良潮州夏布函[N]. 申报, 1923-3-27.
- [18] 佚名. 本埠新闻: 潮州杂货会电争日本增税[N]. 申报, 1924-8-15.
- [19] 佚名. 潮州夏布所增加之出口税碍难豁免[J]. 广东行政周刊, 1927, (8): 37.
- [20] 佚名. 本埠新闻: 请求夏布免税不准[N]. 申报, 1928-8-12.

Preliminary Study on Overseas Trade of Grass Cloth in Jiey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N Wei-wei¹, OU Jun-yo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Normal Education, Jieyang Polytechnic, Jieyang Guangdong 522000, China)

Abstract: The grass cloth is a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 modern Jieyang and there is a large volume of foreign trade commodities in Chaoshan area.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grass cloth has lead to the rough processing mode, strengthened the trade interaction between Jieyang and inland cities and surrounding cities. It had been sold to Seoul,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Meanwhile, the farming and weaving production mode formed in the vast hinterland of rural areas in Jieyang provides labor force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 cloth industry. The overseas trade of grass cloth reflects the commercial network structure in Chaoshan. The grass cloth is on the decline under the influx of foreign cloth and the influence of World War II. This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tent,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arriers to world trade in the traditional grass cloth industry.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Jieyang; grass cloth; overseas trade